



从『通古今之变』看秦朝得失

古代王朝的经验教训之三

□ 张显传

“通古今之变”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好传统，也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的一句名言。其中的一层含义是，人们可以此为镜，运用“通古今之变”的道理，借鉴它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，既不拘泥于古，也不混同于今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提出切合实际、符合需要的为政之道。

秦朝开创的基业

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，史籍中对于中央集权问题有过充分的记录和广泛的论述。秦朝最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。战国时期，秦国顺应变法的潮流，用商鞅之法，移风易俗，赏罚分明，经十年的努力，民以殷盛，国以富强，“举地千里，至今治强”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它为秦国确立独强于天下、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，是古今之变中的一个关键，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。

秦国先后灭掉六国，完成了初步的统一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。

一是皇权取代了王权。统一以前，各国实行的是王权。统一以后，通过“议帝号”，确立“皇”为帝号，制曰“可”，天子自称为“朕”，“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计数，二世、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”。在中央执行机关下设立三公九卿，以公卿制代替世袭制。

二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。秦始皇吸取以往分封制的教训，在各地设置郡县机构直属中央管辖。郡下设郡守、郡尉、郡监等分掌行政、兵事、监察事务。郡下设县，县下设“乡”“里”两级，还有负责地方治安的“亭”，形成了一套地方行政的管理体系。郡县长官由天子任免，不得世袭，较前有较大进步。

三是进一步采取了统一的措施。尤其是北击匈奴，南征岭南，连通西南，并在新征服地区设立郡县加强行政管理。为了巩固统一，又兴修水利、修筑大道、发展经济，还规定“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同轨、书同文字”，进一步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。

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，有利于社会的进步，这是必须肯定的。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辽阔疆域的第一次统一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。但是，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体制造成了“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，倚办于上”的情况。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度，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，它有利于中央集中控制地方政局。但是，由于地方上不能独立思考，就会产生地方治理缺乏弹性的后果。

三世而变之教训

秦帝国自公元前221年建立，从“秦民大悦”到“千古一帝”赫赫一世，到公元前207年，子婴在位46日降汉，三传而亡，历

经了由兴起、兴盛，直至灭亡的过程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》中说：“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所以自镜也，未必尽同。”又说：“当世得失之林也，何必旧闻？”这就是说，古与今是有区别的，政治与现实也是有差距的。所谓“通古今之变”，就是要借鉴“志古之道”作为历史的镜子，不必拘泥于某一点。而作为帝王的为政之道“要以成功为统纪”，必须求助于历史的教训。

秦朝究竟因什么而亡？有什么教训？其一，专制措施之加剧。秦统一后，至高无上的皇权体制发生膨胀，政治走向极端，引爆了各种矛盾，最后导致民众的反抗。公元前213年，作为胜利者的秦始皇置酒咸阳宫举行寿宴，准备“广开言路”。博士淳于越在宴会上引用上古之例，提出“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”的意见。秦始皇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，无限上纲，下令焚书，最后还规定对于偶尔谈论《诗》《书》者处死。对于“以古非今”非议朝政者灭族，“吏见知不举者同罪”。他们还将指责秦始皇“贪于权势”“乐以刑杀为威”的儒生，以诽谤罪活埋。决策失当的秦二世“欲悉耳目之所好，穷心志之所乐”，背负“指鹿为马”之耻，促使政权更快瓦解、恶化，以致最后灭亡。

其二，刑罚手段之严苛。秦始皇决定采用商鞅以法治国的举措并没有错，但要适度。史书上记载商鞅变法的弊病时说：“卫鞅内刻刀锯之刑，外深铁钺之诛，步过六尺者有罚，弃灰于道者被刑，一日临渭而论囚者七百余，号哭之声动于天地”，说明他用法确实有不当之处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，秦始皇兼容战国时期各国的专任刑罚，采用比商鞅更为严酷的刑罚来惩治民众。除连坐外，还用腰斩、大辟、抽骨、镬烹等残酷手段，应有尽有，更为残暴，以致造成“赭衣塞路，圜墙成市”和“天下愁怨，溃而叛之”的状况。后人对商鞅变法曾作过中肯的评价：若“使卫鞅施宽平之法，加之以恩，申之以信”，则他本人不至于受刑法所累，被车裂而亡。这实际上是在说法治要同德治相结合。法治要抓大事，不宜抓很多具体小事，连“弃灰于道者”都要被刑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，必然不能长久，这是秦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其三，民力财力之耗竭。秦始皇为了显示自己有“居中驭外”之能力，广建宫室、修筑长城，修治驰道。从国家需要看，这些建设当然有其正面的作用。但是，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，建设过于急进，使当时的民众不足以应付，形成财力困境和各种徭役之烦。秦末的动乱也就是因为秦法过严，徭役过重，人心怨愤。役卒们在服役途中遇雨，必逾期，而“逾期皆当斩首”。因此，陈胜吴广振臂一呼，天下响应。

其四，迷信自己之危害。秦始皇还到处求仙，迷信神灵，多次巡行“天下”。封禅是一种表示帝王受命于天下的典礼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举行封禅大典、登顶泰山封禅的就是秦始皇。他巡狩郡县，声称“六合之内，皇帝之土”，以“人迹所至，无不臣服”的刻石来颂扬个人的功德，随意耗竭民意，内兴功夫，外事四方，结果弄得海内困穷，民怨沸腾。秦始皇对于自己的迷信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最终也害了自己。他在最后一次出巡时，竟未事先召唤长子扶苏守国，以固根本。当他身死边疆时，就引起了权臣肆意操纵、杀长立幼、谋夺皇权的连锁反应，中央政府立即陷于瘫痪的地步，最后导致秦帝国全面崩溃。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。

其五，遗民报复之严重。秦统一不久，对于六国旧地与旧时的遗民，没有足够的警惕。只将他们安置在咸阳附近。六国贵族不服秦之新政，伺机报复、图谋复国。当国家出现风吹草动时，包括那些旧时代的贵族和一部分新型的富有者就联合起来进行反叛。所以，秦初迁徙天下豪富于关中也就成了制造乱相的一个内因。当政治危机出现时，及时对自身的错误作出深刻的反省、纠正、调整和改革，制定新的策略，是转危为安的良好方。这是最聪明的做法，必须有智大勇的胸怀。可惜秦朝失去了这个能力。唐朝的魏征总结说：“怨不在天，可畏惟人”，说明人民是个决定因素。换言之，民众的意志决定政权安危，是存亡的根本。

“通古今之变”的事实告诉人们，要尊重历史，不仅要看到历史的辉煌，更要看重历史的教训。而且，要抓主要问题，不要被次要问题所迷惑。要抓本质、抓主流，学古是为了今用，这是“通古今之变”的最重要涵义。



史学漫谈

□ 王兆贵

自古而今，战争的起因五花八门，争夺资源也好，争夺霸权也好，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，打起来也必然会以人力物力的消耗为代价。冷兵器时代需要厉兵秣马，热兵器时代需要坚船利炮，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玩不转的。《孙子兵法》在作战篇中开头就说：“凡用兵之法，驰车千辆，革车千乘，带甲十万，千里馈粮。则内外之费，宾客之用，胶漆之材，车甲之奉，日费千金，然后十万之师举矣。”军费开支之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赵惠文王三十年的一天，田单对赵奢说，我并非不喜欢将军您的用兵策略，让我不佩服的是您用兵太多，消耗太大。我听说，帝王用兵不过三万而天下服，如今将军用兵，动辄十万、二十万之众，这是我田单所不服的。赵奢回答，古时天下分众多诸侯，城池再大不过三百丈；人口再多不过三千家。用兵三万攻打这样的城邑，又有何

□ 石志刚

《苏州府志》记载：“冯梦龙，字犹龙，才情跌宕，诗文丽藻，尤明经学。崇祯时，以贡选寿宁知县。”1634年，61岁的冯梦龙来到“地僻人难到，山多云易生”的福建寿宁，当了4年知县。在4年任期内，留下了“政简刑清，首尚文学，遇民以恩，待士有礼”的美名。

善察明断

冯梦龙在寿宁知县任上，处理狱讼案件非常有成效。对待这些案件，他没有主观臆断，亦没有偏听偏信，而是采取调查研究，以事实为准绳，对卷宗进行审核，最终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。

寿宁县一座山坳上住着上村人和下村人，两村人由于历史原因结下世仇。冯梦龙来寿宁之后，出现了一件争斗之事。上村的水牛和下村的水牛进行角斗，周围围观的上村人和下村人很多。时间不长，上村的水牛把下村的水牛弄死了。

上村人和下村人人为此起了争吵，下村人要求上村人赔水牛，上村人坚决不赔偿，两村人将官司告到知县冯梦龙那里。冯梦龙升堂后，将两村的村长，当时的村民代表、牛主、牧童等一并叫到堂上。怎么解决这个纠纷，成为考验冯梦龙智慧的一道难题。如果解决得不公平，将会激化矛盾。

经过详细了解，冯梦龙认真分析、归纳、总结案情，最终给出十六个字的判词：“两牛相争，一死一生；死者同吃，生者同耕。”公平思想渗透其中，解决了此案纠纷。上村人和下村人都接受冯梦龙的调停和判词，而且二村之后过上了和睦的生活。

除陋解患

寿宁的虎患非常严重。当时山林中有一种伤害人畜的花斑虎经常给当地百姓带来祸患。《寿宁县志》中记载花斑虎经常“损伤人畜”。由于寿宁城楼坍塌，加之年久失修，山林中花斑虎乘夜跑入城内，危害百姓和百姓家中牲畜家禽。当地百姓谈虎色变，无奈之下，去城隍庙向神灵叩头祷告，祈求神灵消除虎患。冯梦龙看到此事，没有选择逃避，而是主动去解

兵力与物力的较量——古代战争的基本逻辑（二）

难？这些诸侯如今已并为七雄，他们能聚集十万兵力开战，旷日持久地打下去，就会发生贵国被燕国攻破的情形。齐以二十万兵力攻楚，五年乃罢；赵以二十万兵力攻中山，五年方归。现今千丈之城、万家之邑相对峙，三万兵力能干什么呢？恐怕连城之一角都围不住，野战就更不够了。田单感叹说，我确实比不上您！赵奢是当时东方六国八大名将之一，实战经验丰富，《战国策》用相当篇幅记叙了他与田单的对话，无非是说，用兵多多益善。按照孙子的测算，举十万大军日费千金，若增兵至二十万、三十万，历时五年之久，不知要消耗多少资财？这还只是理论计算，实际运作起来，就不单是烧钱的问题了。

古代交通不像今天这么发达，运输工具也不像今天这么便捷，平地靠车马，山地靠背驮，河道靠舟楫。西晋的羊祜和东吴的陆抗均为一代名将，虽然各为其主，却也惺惺相惜，但自西陵之战交手后竟相斗法，成了冤家对头。当初，陆抗考虑到江陵地势平坦开阔，道路通畅便利，就命江陵督张威筑坝断水，漫漫平地，以阻绝敌寇和叛贼。羊祜打算借助大坝堵起来的水行船运粮，就故意扬言要破坝以通过步兵。陆抗听到

冯梦龙的政绩



决这个虎患难题。首先，他不顾年老体弱，走村串巷、翻山越岭，寻访捕虎能手。然后，他发动百姓修缮城楼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修缮任务。在此之后，他又组织人在山后、树林设置捉虎陷阱。“其制如小屋一间，分为三直，内外壮棧，闭羊左右以饵虎，空其中设机焉。触之则两闸俱下，虎困而吼，众乃起而毙之”。因为措施得当，在很短时间内消除了虎患。

寿宁重男轻女的陋习非常严重。“闽俗重男而轻女，寿宁亦然，生女则溺之”。他写下了对联“神灵有赫，不溺女定生奇男；天道无私，能孝亲必生贵子”，并悬之于寺中，以示反对溺女陋习。他通过调查研究，亲自撰写发布《禁溺女告示》。《禁溺女告示》中对溺女行为进行道德劝诫：“为父者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其中从何而来？为母者你自想，若不收女，你身从何而活？”“如今好善的百姓，畜生害怕杀害，况且活活一条生命，置之死地，你心何安？”对规劝不听者则进行实际惩罚：“本县拿男子重责三十，枷号一月。”道德上教化、律条上惩罚，最终极大程度地遏制了寿宁的溺女行为。

寿宁民贫地瘠，说其民贫，因为“民无余欠，库无余财”；说其地瘠：“山无涓滴不为用，山任崔

建基立政

冯梦龙在寿宁主政期间，“学校虽设，读书者少”“经书而外，典籍寥寥，书贾亦绝无至者”。由于寿宁地理位置偏僻，百姓不重视读书，冯梦龙就在寿宁修繕县学、兴文立教，自己还亲自捐出银两资助所建之学。同时，他还延聘著名儒者在县学中授课。

冯梦龙还颁布《四书指月》，亲自讲解，在他的倡导下，寿宁学风渐兴：“士欣欣有进取之志，将来或未量也。”他还将自己在寿宁任职的经历写成志书《寿宁待

对方的军需给养。

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，袁绍兵强马壮，以十万大军对决曹操的两万人马，耗时近一年之久。在官渡之战相持三个月后，曹操处境十分艰难，前方兵少粮缺，士卒疲惫，后方也不稳固，曹操几乎失去坚守的信心。一天，他见运粮士兵疲于奔命，于心不忍，不禁脱口说到，半个月后一定打败袁绍，不再劳累你们了。就在曹军粮草告竭、首尾难顾的节骨眼上，袁绍谋士许攸献策，分兵两路，一路攻打官渡，一路夜袭许昌。可袁绍多疑寡断，唯恐中了曹操诱敌之计，恰逢审配派使者来报，许攸家人贪赃枉法，已被收押。袁绍见书大怒，进而怀疑他是曹操奸细，不杀头就算给面子了，哪里还会采纳他的计策？许攸无奈，只好听从左右劝告，转而私奔曹营。正要解衣就寝的曹操，听说昔日好友许攸来投，高兴得顾不上穿鞋，光着脚出寨相迎，远远地抚掌欢笑，携手共入营帐，抢先拜服于地。曹操何至如此，因为他绝处逢生的机缘降临了。若不是曹操获取了许攸的情报并采纳了他的计谋，派轻兵夜袭乌巢，将袁军粮草悉数烧毁，曹操即使不至完败也要遭受重创，哪里还能以弱胜强？

志》，该书文风朴实、流畅优雅、内容丰富，详细地记载了“疆域、城隘、县治、学宫、土田、户口、升科、赋税、恩典、积贮、兵壮、狱讼、物产、盐法、风俗、贡举、官司、劝诫”等内容，既是他为政以文、感化百姓过程的展示，也是他施政思想的真情流露。

冯梦龙在寿宁期间，积极提倡植树造林。冯梦龙之前二十年的寿宁知县蒋诒，曾经大力提倡种树，“捐钱植松树数百于九岭，以蔽行人”“苔罪亦许种松自赎”。九岭是西南到寿宁的必经之路，冯梦龙上任之时路过此地，并在蒋诒所栽之树下面歇脚纳凉，对蒋诒的行为大加称赞。冯梦龙在前任基础上，注重潜绩打造，继续倡导种树植树。

明末有位民间藏书家在《寿宁冯父母诗序》中称赞冯梦龙的政绩：“计闽中五十七邑之间，无逾先生，而令之才亦无逾先生者。顾先生虽耽于诗，而百端苦心，政平讼理，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。”“百端苦心，政平讼理”是对他政绩的最高评价。

